

# 中文系在当代文学活动中的新角色

陆兴华

(浙江大学 国际文化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要]中文系在当代文学活动中正面对着新的角色定位问题,为担当这些角色,必须处理好几层关系:读写教学与理论研究的关系;捍卫和继承文学传统与介入当代文学活动的关系;培养职业读者与培养学生的文学资质的关系;文学在今天的多元存在与深入研究各种亚文学和各种文本间的关系。

[关键词]文学生产和接受;文学再生产;文学体制;文学资质;读写教学

[中图分类号] I0-05;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0)04-0035-04

##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in Modern Literature

LU Xing-hua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Strategies have to be found for the new roles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in modern literature in dealing with the following relations: studies and teaching of reading; adherence to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the advancement of modern literary creation;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writers and improvement of the literary background of students in general; the multi-dimensional existence of literature and the studies of sub-literature or intertextuality, etc.

**Key words:** literary creation and reception; literary reproduction; literary institutions; literary competence; reading and writing strategies

一场全国性的语文教学反思以及近年来关于大学教学如何重振人文关怀的讨论,把中文系在新时代的文学生产和接受中面临的困境、它的角色定位、它在未来发展的侧重点以及学术风格的改变、开拓等等问题推到了前台,我们必须尝试着回答它们。

传统观点认为,中文系应全面负责整个大学(不光是中文系)的本族语的读写教学,并代表这方面的最高水平。在这个基础上,中文系同时又成为每一时代的文学生产和接受的中介,批判和反思的堡垒。它由古典文学、语言学、修辞学、中外文学理论等研究组成的知识结构,为捍卫和延续文学传统并介入当代文学活动,提供了强大支持。中文系虽不能“培养”作家,却能激励和呵护年轻人获得进行具有丰满的道德、伦理责任感的个人写作和阅读的资质,成为文学批评活动的专业基地,通过中文系的“文学再生产”,为文学生产第一线服务。

但在近五十年来,随着新闻系、外语系等院系在学院体制中的崛起,公文写作和各种媒体写作与文学写作的进一步分工和远隔,文学研究越来越彻底、精细的劳动分工,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剥离了中文系的许多传统的整体“教化”功能,这使得中文系不仅不能全功能地去介入和关怀当代文学活动,反而越来越畏缩在自己的体制之内。西方文学理论话语的大量引入虽然增加了我们在文学研究中的方法论自觉,却也使文学研究者更看透了中文系作为文学体制的保守力量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惰性,倒使它率先成为被解构的对象——尽管在大学的所有院系中,中文系其实仍是最忠诚

[收稿日期] 1999-12-28

[作者简介] 陆兴华(1964-),男,浙江绍兴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国际文化学系讲师,主要从事文学与艺术批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于其“问题性”，最勇于自我拆台，实际上也比其他系科更忠诚于大学体制和理想的系科。

重新定位中文系在当代文学活动和文学体制中的角色，既能使我们认识和自信于它必须承担的振兴大学人文教学的新任务，也能使它在当代文学创作和接受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为了重新定位中文系在当代文学活动中的角色，处理好以下几层关系是当务之急：

### (一)兼顾读写教学的一体化与理论探索的多元化

无论是站在文学“精读”派还是文学“解构”派的立场上看问题，大学的读写教学都是每个知识人的人文训练的根本，中文系的读写教学应成为整个大学读写教学的示范。必须重新强调中文系读写教学在整个大学、乃至整个民族文学活动中的整体功能，使每个学生（它所面对的全校学生）都达到与本民族文学传统以及与各时代相称的文学资质，成为当代文学生产和接受的有生力量。如果每一时代的文化是这一时代人反思传统、批判流行趣味加上结晶于这一时代全新精神素质的实践所促成，那么，中文系应该是这一实践的一块试验田，一个发动机和推进器，一个“文学行动”的激进堡垒。

结构主义流行之后，写越来越被看作一种“读”，读写能力被吉登斯这样的思想家看成一种在“现代性”面前自我保护和自我治疗的技术，一种人人需要的“生活政治策略”<sup>[1]</sup>。读和写的能力成为社会中的个人的重要的超越力量，它的作用领域远远超出文学领域之外，成为个人自我解放的重要途径<sup>[2]</sup>。中文系在大学系科中的地位只能来自它在读写教学方面的能力和权威，来自于受教育的个人对中文系所教授内容的真切需要和信任。中文系要想承担它的历史责任，必须占领和守护自己的这一天然领地。

中文系理论探索的多元化不光是为了它的自我辩护，不光是为“文学批评而文学批评”，为话语生产而话语生产，也是为了促进它的读写教学的不断创新，使中文系在介入社会时增强自我反省意识，清醒地完成它在本民族的文学活动中的组织功能。只有理论的繁荣，没有高质量的读写教学，中文系在文学活动中的角色将是苍白的。美国大学各英文系近四十年里走过的道路，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它们曾通过理论研究的快速发展而由衰落转向强盛，今天却又从其理论的生产过剩，转向读写教学这一语言文学系最基本的功能<sup>[3]</sup>。

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对于当前语言文学系面对的理论繁荣而读写教学每况愈下这一困惑提出的三点劝告，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认为，我们在面对各种理论和各种文本解读时，不要“想当然地接受任何一种东西”，而是应该做到三点：其一，“回到文学研究的现代传统的那些基础文本”中去，这些基础文本大概包括基本作品和基本理论文本，像尼采所说的那样，“持久地慢慢细读它们”，对它们进行语文学式、语言学式的阅读；其二，追溯那些隐蔽的文学理论的预先设定的基础，譬如社会、自我、语言、“事物”，使职业批判家和普通读者都能意识到这些预设的有待论证性；其三，充分认识到慢读对检验基础、验证基础或理性原则对于大学文学教学体制的颠覆性和威胁性，坚持批判的持久性和彻底性。因为大学文学研究到目前为止仍一直受到莱布尼兹的理性原则的支配：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而且应该得到说明，一切都有其原因<sup>[3]</sup>。如此看来，文学理论的研究，根本上讲也就是对那些“基础文本”的不断的革命性的阅读，并不只是纯理论思辨，就中文系的教学而言，理论研究是反思和改进读写教学的上好手段和途径，但不是目的的全部。

反过来讲，当前理论流派的纷至沓来，造成理论的过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我们不能彻底地、革命性地阅读那些基础文本，通过高质量的读写教学对文学基本理论和原则作验证和建设性的批判所造成的。在中文系的教学中，教师们匆匆地对语文学、修辞学和诗学稍稍涉及后，就很快心安理得地滑入形而上学、神学、审美生理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艺术史、伦理学、自然史等等之中，名曰学科交叉，实际上却反而将基本的读写教学看成了一种技能培训。连作为职业读者、典

范读者的文学系的教师，都常常忘记对于“基础文本”的基本阅读这一批判、解读要求，怎么能指望普通读者去这样做？又怎么能完成文学批评这一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的基本功能的学习？事实上，人文科学乃至所有的科学的自我批判、自我突破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对于其“基础文本”的基本阅读，这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

## （二）既回忆、铭写、纪念经典作品，与之对话，又努力批判和删存当代流行的、通俗的作品

作为优秀文学流传物的经典作品，在每一个时代都面临被看透、被定型、被体制化的危险。按美国批评家特利林的说法，大学文学系一方面编织批评话语，将它们体制化；另一方面，又通过“理论上”的努力，将它们从时代的偏见和禁锢、从像中文系这样的专业机构对它的体制化中解放出来，给它们松绑。使每一代人清新地“回忆”流传至今的本族语经典作品，发扬民族文化，是历史赋予中文系的任务，鉴定和删存当代文学产品，将当代优秀的流行作品铭写进整个文学传统，又是中文系的历史责任。

在兼顾这两者的同时，中文系又必须以社会学、病理学的态度去面对当代的一些“问题”作品、“异质”作品，以及某些经典作品在当代所经历的危机，帮助当代读者与文学作品、与此时此刻的文学活动保持真实的、充分的、有意义的历史间距，达到一定的理解张力。在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携带着现代性这样的问题基因的时代中，文学系已经不光是作品的博物馆、鉴定所，也是其疗养地、诊所了。切忌扛着几项大标准到处去“选秀”、“选美”，而漏过它应真正关注的东西：我们时代真正发生着的文学活动、文学事件——它们在每个时代带着自己的问题，而这一时代并不比别的时代无辜或更有罪。

即使久经文学接受史考验的经典作品，也是潜在地处于不断被检视、被怀疑、被吸纳或排除出文学传统的过程中的<sup>4]</sup>。它们在每个时代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与别的艺术品如绘画、雕塑不同的是，它们处于一个没有围墙、没有明确分类、没有保存和修复机制的一个开放的博物馆内。经典作品实际上也是一个含糊的、不确定的群体，并不是一个奥林匹斯山上的神圣文本陈列馆，不朽作品只是我们的一个赞美的说法。每个时代的文化总是实用主义地以某种等级和标准来评价以前的或当代的作品，严肃、流行、通俗，实际就是一种我们加给它们的等级。中文系不应轻易被经典、流行这样的定性所迷惑，而应反思这种分级制背后的预设及其合理性。有时，为了捍卫作品的真实的历史地位，更合理、公正地对待整个经典传统，还应努力打破这一分级，更敏感、更宽容地对待经典作品或当代好作品。

## （三）培养职业读者与开发学生文学资质相兼顾，中文系的培养目标是开放的

一方面，中文系必须不断培养“职业读者”——文学工作者、文学教师、编辑、记者等；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克服这一“既得利益”，回到文学的“内在利益”上——开发学生乃至全社会的文学资质，以体制为阵地，来捍卫新生一代的文学冲动、需要和趣味，使其不受流俗的、意识形态的特权及僵固态度的压制和侵蚀。

职业读者为什么研究文学？除了谋得一个饭碗，还有一个底线，那就是：他（她）有时的确是“为文学而文学”的，也需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学资质。不如此，他们怎么和那些商业味十足者及与艺术家勾结的画廊组织者、评论者、艺术制作人、艺术掮客们相区分？培养职业读者是大学建制要求于中文系的一个目标，但要更好地达到这一目标，或要纯洁地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课程安排、教学目标设置、教学评估中对学生文学资质的提高作基本的强调，不要盲目地受社会需要和新的社会分工的误导和诱惑。反过来讲，只有强调了文学资质的培养，才能为教和学的双方提供最核心的动力，才能使教师和学生更“饶有兴趣”地、更清新地、更革命性地去阅读文学文本，更好地培养出职

业读者。

中文系在培养职业读者的过程中,很自然会陶醉于它自己的体制力量,忘了它自身所需的“自我奠基”。对它的最好的自我辩护,就是在培养好职业读者的同时,努力去解放、扩展当代读者的文学资质、文学视野,主动去吸收体制外的话语力量,来激发、扩展、挑战自己的话语生产和批评权威,在文学体制内合格地完成只有它才能完成的任务。中文系有它自己的体制,但它仍必须假定任何一个个人无需处于某个阶层,勿需某种特殊的知识、特殊的教育,就能阅读一首诗、一个复杂的作品。这表面上看会使中文系的权威和主宰地位毁于一旦,但长远地看,中文系只有将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人的阅读以及他们的文学资质的提高看作自己的关注范围,将自己的理论研究和教学活动真正放入我们民族文学活动的大范围中,才能整体地去关怀这个时代的文学活动,才能最大可能地完成其职责。

#### (四)兼顾对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各种比较文学、弱势文学等的研究,重视文学研究的地方化

在我们这个后印刷、后书写的时代里,中文系的文学理论研究必须扩大视野,重视书写作品以外的各种媒体里的文学活动,正视我们当代这个以视觉为中心的时代文学活动的新特征,比如各种媒体里的文学活动,又比如当代文学的强烈的即兴、共时、互文性。中文系应尽可能多地吸纳当代文学活动的新质素,尽可能广泛地介入当代文学活动的各个层面、各个媒体、各种文本形式,完成它合理地捍卫文学传统、扩展文学活动的可能疆界,充分施展其批评功能,全面地为本时代的文学活动负责这一首要任务。中文系千万不能去做这方面的保守派。

与此同时,中文系又必须反思它传统上一直压制、一直将其视为边缘化的体制内的非主流研究领域,如各种层次的比较文学研究,各种弱势群体、不稳定文化群落的文学活动,尊重文学研究的地方化,使其研究视角、题材、方法和风格多样化、全球化或全球地方化。这样做不仅是出于道德同情或搞平衡,也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文学体制内的自我反思,挖掘那些过去被忽视或压制的文学活动对于“主流”文学活动的结构性潜力,使之成为文学研究更广泛、更深入的新动力。

中文系还应重视民族文学范围内、民族文学之间以及世界文学范围内的广泛的文本间性。在这个至少已达到相当程度的文化全球化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是超民族的、后地理的、被各种媒体加速中介着的时代里,中国的、外国的、主流的、非主流的、高雅的、通俗的、严肃的、流行的、经典的、创作的和翻译的文学文本之间,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层次的文本间性。研究者和师生不应光局限在自己的领域内,而应放宽视野,拆除边界,以民族身份和同一性(national identity)以及本民族文学资质为核心,以多极和多元的当代世界文学图像和艾略特所说的每个“文学个人”都必然会加入的、自荷马以来整个世界文学为传统背景的全球文学视野为上下文来阅读、写作和批评。

#### [参考文献]

- [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1998.246—261.
- [2]萨特.论文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96—123.
- [3]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构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52—271.
- [4]莫瑞·克里格.批评旅途 六十年代之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98—223.